

中国公共考古的新思路

——罗泰先生专访

〔美〕罗泰¹ 〔中〕曹峻² 魏峭巍² 张勇安²

(1.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洛杉矶;2.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在公共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也得到飞速提升,特别是国际化的趋势越发显著。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公共考古可以从加强中小学师生的考古与遗产保护意识、充分展现考古学术问题论争等方面入手,在坚持学术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情况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发展道路。

关键词:公共考古 中国考古 国际化 遗产保护 罗泰

中图分类号:K851

文献标识码:D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考古学与艺术史教授、扣岑考古研究所(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东亚研究室主任、奥巴马总统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德国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荣誉研究员、浙江大学荣誉教授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是长江流域古代盐业生产国际考古项目(1999—2004)的主要负责人之一,2010年起担任西安杨官寨国际田野考古学校导师。先后求学于德国波恩大学、中国北京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关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尤其重视通过考古学研究解决重大跨学科和历史问题。所著《孔夫子时代的中国社会(公元前1000年—前250年):考古学实证》(2006)一书荣获美国考古协会图书奖。

2015年12月14—17日,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先生在内的三位著名学者分别做了公共考古的讲座。论坛期间,我们受《东南文化》委托,就公共考古及相关问题采访了罗泰

先生。

曹峻(以下简称曹):罗泰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此次参加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并专门做了关于早期中国商品经济的公共考古讲座。与专门研究文化遗产的专家相比,您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可以为公共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独特并且值得重视的视角。我们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罗泰(以下简称罗):公共考古需要很多专业知识,虽然不是我主要研究的方向,但我很在乎也很关心这方面,我非常乐意谈这个话题。

魏峭巍(以下简称魏):您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求学,当时正是中国社会转变最快的时期,可能赶上了许多学者想做但没能做、或者没想过做的事情。您觉得这三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领域给您印象最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罗:中国考古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很难一口气说出来。因为变化不完全是考古的,而是全国的、甚至全世界的,各方面、各层次的变化都会影

收稿日期 2016-02-18

作者简介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考古学与艺术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盐业考古。

曹峻(1977-),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东南地区先秦考古。

魏峭巍(1981-),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文化遗产保护。

张勇安(1975-),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史。

响到考古。与我自己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还是中国考古的国际化。我深深感觉到,中国考古学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一方面越来越包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比如我当年来北大读书的时候,外国学者是不能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的,我们能有一天半的时间访问北大考古工地就已经很好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人员到国外学习,最近还有带队到国外开展考古工作的,比如南京大学想在伊朗,西北大学想去巴基斯坦、西伯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蒙古、中亚、中美洲等地工作;甚至有考古人员去非洲做考古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我昨天才知道,洪都拉斯和中国虽然还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已经开始通过考古合作建立友谊。我还听说尼加拉瓜马上要修建由中国投资的跨国大运河,这将是大规模开展考古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希望也会有大批的中国考古学家参加。

坦白地说,这些发展对大家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当然会有一些人怀疑这种全球化的过程是否会使中国考古失去特点,并为此而感到忧虑。但我觉得,中国考古的特点主要在于材料的性质(研究方法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材料的特点而形成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保持这个特点而把考古学研究封闭起来;相反,中国考古会随着国际化的不断增强而使自己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明显,所以中国考古学界不用害怕国际化,可以大胆地包容它。我早已发现,相当一部分反对国际化的学者是对自己的学问缺乏自信。其实西方考古界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考古学家的训练,在不同的地方积累经验很重要。我们学校有专项经费用来鼓励研究生花至少一个夏天在不属于他的研究领域的地方参加田野工作。比如有个专门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学生,去年到秘鲁参加考古项目,学到许多可以应用到中国研究主题上的知识;同时他也在秘鲁留下很好的印象,这是相互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韩国、日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还在美国的缅因州(Maine)及英国的威尔特郡(Wiltshire)参加了考古发掘。

魏:就像您说的,中国考古原来只是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但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学术交流会越来越简单,因为大家都在这样的全球话语体系里,你可以理解我的、我可以理解你的,相互之间只是研究材料的不同而已。所以说国际化是推动中国考古发展非常重要的内容

罗: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中国考古在国外就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我们现在还在面临这个问题。不管在北美还是欧洲,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古代文明的考古研究地位已经确立,美国、欧洲有考古专业的学校往往都有埃及考古的教职,而且没有任何人质疑这一设置。但是对于中国考古学,好几所应该设置教职的学校都没有。这些学校也许有中国语文课,但没有中国考古专业,更没有分时段研究中国考古的专家。我们UCLA有两个这样的专家是非常少见的。在欧洲也很少,甚至像考古传统非常优秀的德国,到现在也还没有一所大学有中国考古的教职。所以,虽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的地位明显提高了,但相对还在初级阶段,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地位。

曹:那您认为在近30年来中国考古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共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这两项事业发展得如何?

罗:我今天上午也和王巍所长谈到这一点,我们回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认识的地方行政干部,他们都订《考古》、《文物》杂志,并且很认真地看。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存在这么一个具备一些知识并且关心考古的群体,而不是只有考古界的人才关心考古。考古学在中国一直有群众基础。近年来中国社会富裕,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考古这类属于上层结构的学科感兴趣。他们不一定要将之作为职业,但他们想了解专家的意见和看法,另一方面他们还想直接参与、亲身体会考古工作。而满足这些需求也是考古界的重大责任。这个责任怎么履行是需要好好思考的。我在美国每年至少开几次公开的演讲会,介绍我最新的研究或者一般的课题。美国有一个半学术、半业余的考古学机构(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简称AIA),经常给我们在很多地方安排演讲,包括非常偏僻的地方。我作为AIA选派的演讲者,每次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这让我非常感动。演讲费很低,是象征性的报酬,但这绝对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一种义务活动。

中国最近也开始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有考古学家组织爱好者去旅游,举办考古夏令营,让孩子们在放假期间到考古工地参加发掘。很可惜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经历,如果有的话,我肯定会非常喜欢。

张勇安(以下简称张):现在爱好和喜欢考古

的中小學生越來越多，家庭也有足夠的經濟力量支撐他們的興趣。我們在考慮舉辦一個小學生的國際考古夏令營。

羅：這是很好的想法。蘇聯就有過這樣的制度，中學生可以花一兩個夏天參加考古發掘。他們非常認真，而且視角特別，看問題和成年人不完全一樣，所以对考古學研究往往會起促進作用。重要的是，這樣的制度給考古工作提供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中國也可以做到，如果面向國際的話，一定會有許多人參加。現在美國有越來越多的中學生在學漢語，他們很崇拜中國文化，想到中國來。你們可以舉辦考古夏令營，讓美國孩子一面學中國文化，一面結交中國朋友。

曹：這次您專門開了公共考古的講座，結束後還有很多人留下來想再和您交談，但時間確實不夠了。

羅：這次考古論壇的公共講座和上次不一樣。上次在市中心的上海博物館，有老百姓去聽，所以那些演講就必須簡單。我這次的演講，在場的有這麼多著名學者，聽眾好像也都是大學生，所以還不是一次純粹的公共考古活動。如果是公共考古活動，就要介紹非常多的基本背景。讓自己的演講和聽眾的知識水平相匹配，這是大家都要學會的。其實這也是考古學家訓練的一部分。UCLA有一個制度，就是研究生拿到夏天做研究的獎學金後，要到中學去待幾天（每一千美金待半天），介紹和交流考古知識。只不過我們還有一個關鍵的事沒有完全解決，就是中學教師事先要提供一個框架，讓學生有所準備，比如讓他們知道考古學是什麼，和正在學習的其他內容有什麼關係等。但這不是容易的事，因為很多時候教師自己也不太了解考古學。

曹：這是不是和美國社會對考古學的關注度有關係？

羅：當然有關係。其實美國中學教師有義務每年接受若干天數的專業訓練，我們應該想辦法在這些訓練里給歷史教師們加進一些考古的內容。

曹：中國已經有這方面的工作，比如最近北大正在面向全國的中學歷史教師舉辦考古培訓班。

羅：這很關鍵，可能就是公共考古最需要的環節。在大學和老百姓之間還有一些缺環，中間最能夠起作用的就是中小學甚至幼兒園老師，如果我們能夠讓他們傳遞考古知識，那將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儘管我們只接觸一個中學老師，但

這個老師面對的卻是一個班級甚至一所中學的學生。這樣的傳遞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尤其在中國的教育制度下，應該比美國更容易做到。

魏：說到美國，有很多人認為所謂的公共考古是從美國傳過來的。

羅：根本不是，美國的公共考古目前為止是比較弱的，比較好的如蘇聯，剛才已經談到，讓小孩子有機會在暑假里參加考古發掘；還有北歐的瑞典、亞洲的日本也非常好。

魏：我們中國的學者比如蘇秉琦先生不斷強調考古要大眾化，考古學家不能只做學問，而要加强和群眾的接觸；張忠培先生、高蒙河教授也指出，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發掘半坡遺址的時候就開始舉辦面向公眾的考古展覽。以前一提到公共考古就會說是美國人查爾斯·麥吉姆西（Charles McGimsey）出了那本《公共考古》（*Public Archaeology*）的書，中國國內才開始關注這個領域。剛才您這麼一說後我們更加明確，原來美國的公共考古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發達，或者說美國並不是公共考古理念那麼深入的地區。

羅：當然美國也開展一些活動，主要在放假的時候。比如美國很多國家公園有考古遺址和遺址博物館，還有參觀中心，都是聯邦政府舉辦的。聯邦政府在国家公園保留區里有這個義務，而且工作做得非常好，很多著名學者都在這個系統工作過。另外每個州也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儘管有的州做得很認真，有的州相對落后。這樣的區別不只是和各州的經濟狀況有關，還和整個思想文化有關。有一些州在中學里都不准許教授進化論知識，所以就更不可能開展早期的考古研究。但是在美國，考古並沒有被包括在教育系統里，而且大部分地方考古遺迹很少。當然在亞利桑那州的孩子們，因為到處都有重要的考古遺址，會比考古遺迹極少的威斯康星、明尼蘇達等州的孩子們有更多的機會獲得考古知識。

在美國還會遇到文化遺產保護和土著之間衝突的民族問題，從事北美考古的人最近幾年受限制比較嚴重，以前他們確實太不重視土著人自己的觀點。現在土著人說“這是我的祖先”，其實未必都是；考古學家用科學方法比如DNA，研究一個地方的遺迹，可以證明這些遺址和當代的土著毫無關係，但是後者根本不接受。他們往往說所謂科學的觀點是前後變化着的，他們有祖先傳下來的傳統知識，不接受所謂的科學觀點。因此，

考古学家也不能很轻易地说土著人是错误的,而是要表示尊敬,慢慢说服他们,虽然也不见得能够说服成功。

曹:近些年在中国,在社会潮流、经济发展、文化需求、学科壮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公共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宣传手段和力度都极大地增强,确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您怎么看待这股潮流,您认为这种现象有什么利弊?

罗:包括公共考古在内的考古工作总是要找办法符合当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情况。公共考古在最近十来年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你说得很正确,现在是个潮流,大家纷纷尝试各种办法,看哪个行得通,然后根据经验慢慢向前发展。现在很难说十年以后会怎么样,我当然希望目前大众对考古的关心不是暂时的,不只是一个时期的潮流,希望对考古的重视和兴趣能够在人们的头脑里深深扎根,这将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很有利的环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考古学就没有明天。如果这个社会普遍感到我们的工作是多余的、没用的,或者不能理解的话,那这个学科就不能长久持续下去。这是一个重大挑战:我们要在不放弃学术标准的前提下,把学术成果和全世界人民分享。这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些好的手段,而不能完全照搬以前的方式。在中国开展公共考古肯定要符合中国特殊的条件,虽然可以向瑞典或者苏联、日本学习经验,但毕竟要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和特色。

魏:您觉得这种热潮有时候会不会起阻碍的作用?您在研究的时候,当地政府会不会说不能这么做或者不能那么做,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罗:对,出现这种情况时就要慢慢去解决,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有兴趣总比没有兴趣要好。有的时候当然会出现麻烦,比如昨天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演讲之后有位姑娘提及“飞碟”。虽然对飞碟感兴趣是她的权利,但她问一个考古学家考古与飞碟的关系,就比较奇怪了,幸亏伦福儒教授给了她特别好的回答。但是如果当地政府问考古学家有没有考古材料证明这里有飞碟,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要比较全面地把考古知识引入大家的常识,这虽然难,但还是有望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被逼迫接受知识、被填鸭子,而是,就像在超级市场一样,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喜好去选择商品,最后到柜台付钱。因此,毫无疑问我们的知识应该包装起来成

为产品,尽管我们不直接靠这个赚钱,但是最后还是还是要依靠其丰富性与多元性吸引顾客来选择。我们也不能只是骄傲地说我们专家的意见才有学术价值,而是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比“飞碟”更加实在,更加好玩,更加有意义。所以为了让全社会都参与进来,我们要培养一批专门的人才,这些人才可能不在大学教书,而是在中学或者媒体工作。这些工作很重要,所有的专家都应该重视并尽量给予帮助。

魏:有时候媒体参与进来对考古学未尝不是好现象,比如说曹操墓刚发现的时候,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很热闹。其实如果没有人附和的话,考古学家可能就很灰心了。

罗:曹操墓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如果有人明明知道不是,只是为了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而说“是”,那就比较悲哀,所以我强调不要放弃学科的学术标准。你说的公共考古的“弊”可能就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被要求说不该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坚持原则。

魏:文化遗产的热潮有时会给考古学家很大的压力。

罗:不管怎么说,作为考古学家我们必须实话实说,不然不会赢得尊敬。对于特别维护地域利益的人来说,可能还要考虑来自地方政府的经济诉求。考古学家说“是”或者“不是”,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使得事情变得很复杂。这应该不是公共考古的直接问题,而是考古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个题目。在我的经验中,实实在在做研究是最具有永久性的。任何学科都这样,考古只是一个例子。不能因为这是公共考古,为方便公众理解而把学问过于简单化、甚至引向错误的方向。一旦公众醒悟,他们会认为这个考古学家不可信了。这虽然属于一般的心理学范畴,但却是公共考古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在大家对考古这一领域都不太熟悉的时候,往往存在这个危险。

曹:中国考古学会在2014年成立了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可见公共考古在中国已经引起业界极大重视。那您对中国公共考古将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好的建议?

罗:如何促使公共考古事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是需要我们仔细思考的。我常常在一个问题没有定论的时候,给学生甚至一般观众解释学者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开展公共考古也是这样,哪怕情况比较复杂,也可以尝试展示考古学界的分歧。对

非专家来说,专家学者之间的争论是很有意思的。别以为大众是公共考古的消费者,专家们就一定要先下一个不容怀疑的结论,其实更有意思的是让公众自己思考学者们当前所关心的学术问题。有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想出或者发现一些线索帮助专家解决问题,即使不能完全解决,他们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公共考古组织让一般老百姓进入考古学界的方法之一。考古爱好者往往是聪明人,向他们展示实实在在存在于考古学家之间的争论,并且认真地给他们解释,是向他们表示尊敬,一般的老百姓会很感兴趣。

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老师在微博上关于二里头遗址的讨论就是这样的,他会告诉大家二里头遗址的信息,但并不下定论说二里头文化究竟属商还是夏。所以许宏老师的微博上有无数粉丝,每天有各种讨论和争论。

罗: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学家还不知道,许宏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许宏能公开承认自己不知道,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对自己的知识负责。不知道并不等于没有自信。这种有意思的讨论能够激发大家的兴趣,这是很健康的。学者的看法不用完全一致。王巍所长昨天也说了,我们现在要接受文化的多样性、观念的多样性。正因为大家观点不一致,所以才要进行学术研究,并把它作为我们更加了解事实的手段,反之学术就得不到发展。尤其是在考古学科里,要期待将来的发现能把现在的观点完完全全推翻。这没有关系也不可惜,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思考是基于当时的材料,哪怕今后有人证明当时是错误的,也并不减少当时的研究的重要性。可能

正因为被证明是错误的,才能有下一代的学者来纠正——其实纠正本身也会受时代所限而未必就一定正确,但学术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不断向前发展的。

魏:公共考古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因为民众是多样的。

罗:而且古文化也是多样的,尤其是中国这么复杂的文化体系,不能以单一的眼光来看待。

曹:您这次的公共讲座,从盐、青铜、原始瓷三种物资的生产与运输介绍中国早期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些观点与我们从史料里得到的看法差不多。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您的讲座是换了一个视角、一套材料来看中国的先秦史?

罗:显然你看透了我公共考古演讲的重点。我的主要目的不是给大家新的内容,也不是解决问题,我就是想从物质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从而更加确切地研究各个时代在这方面发生的变化,了解什么材料起了什么作用。也许把所有研究重建的话,得到的认识会比我们以前从文献资料得到的更加具体、更加丰富,当然也可能有所不同。公共考古首先要让大家明白,考古学的研究其实可以放在已知的体系里。原则上这是不矛盾的,这样会让人家比较容易接受新的内容。

曹、魏、张:感谢您带给我们这么多关于公共考古的新思路与想法,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罗:谢谢!

采 访:曹 峻 魏峭巍 张勇安

录音转写:曹 峻

执笔整理:曹 峻

(责任编辑、校对:毛 颖)

The New Approaches about Public Archaeolog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Lothar

[America] Lothar von Falkenhausen¹ CAO Jun² WEI Qiao-wei² ZHANG Yong-an²

(1.UCLA, Los Angeles; 2.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Nowadays public archaeology has been gain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According to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Professor at UCLA, in line with the country's rapid growth in economy and culture, Chinese archae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drastically with a prominent trend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 that circumstance in consideration, Prof. Falkenhausen suggest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of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o create channels to show to the public the academic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archaeological issues. He believes with academic principals as the premise and tak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ferences into account, Chinese archaeology is to have a development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ublic Archaeology; Chinese Archaeology; internationalization; heritage protection; Lothar von Falkenhausen